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 年 9 月 10-13 日)

1、《报业辛迪加》：“9·11”更意味着全球化所造成的恐惧扩散

9 月 9 日，《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 的文章《“9·11”事件如何改变世界》。作者回顾了“9·11”事件以来世界恐怖主义及反恐战争的互动与发展变化。为应对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国家反恐、情报搜集、军事能力提升，国家间反恐合作增加，致使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未能再次发生，恐怖主义呈现出不再以主要大国为袭击目标、恐怖主义区域化、去中心化的特点。“9·11”也开启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全球反恐战略，但作者以后见之明认为在阿富汗、伊拉克推行反恐战争取得的成果有限，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惨重。对外，反恐战争导致美国偏离战略重心，单方面对外干涉也损害其声誉，降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对内，反恐战争动摇了美国冷战胜利的信心，加之 2008 年金融危机，美国内社会经济繁荣度下降，新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抬头，加剧国内分裂。作者强调，相比恐怖主义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of terrorism)， “9·11”事件更体现了“全球化的恐怖之处”

(terrors of globalization)，国家边界和距离可以被轻易跨越。尽管恐怖主义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不能定义未来，但未来恐怖主义的威胁将持续存在，将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方面。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onpoint/how-9-11-remade-the-world-order-by-richard-haass-2021-09>

撰稿人：任怡静

2、《大西洋月刊》刊文分析“9·11”后美国的政策失败

9月8日，《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美国记者、历史作家加勒特·格拉夫（Garrett M. Graff）文章《“9·11”后美国几乎走错了每一步》。文章首先指出，“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和政府指挥体系陷入恐惧之中，越来越多未经核实的情报传递到决策高层，最终导致布什政府发动了一场针对模糊的“恐惧和邪恶”而非针对具有明确成员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组织的战争。其次，司法程序存在缺陷。美国将恐袭嫌犯列为“敌方战斗人员”（enemy combatants），关押在秘密监狱并使用酷刑，在军事法庭而非联邦法院审判，损害了美国的道德声誉。美国国内，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将争议性的移民和边境管控部门与非争议性的应急管理部门合并，不仅使后者被忽视，而且导致建立违背法治的“州立融合中心”（state fusion centers）情报共享机制，并导致警察装备军事化、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腐败等系列问题。对外政策方面，美国依赖的埃及、巴基斯坦、沙特等盟友政府本身就

恐怖组织关联，在阿富汗、伊拉克扶植的政府缺乏合法性。此外，布什政府将针对具体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战争扩大为文化价值的冲突，刺激了美国的排外情绪和对穆斯林的仇恨，掩盖了本土恐怖主义犯罪，加剧枪支泛滥，使美国社会更加分裂和恐惧。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1/09/after-911-everything-wrong-war-terror/620008/>

撰稿人：倪远诗

3、《外交政策》：美国是如何内政化恐怖主义化的

9月11日，《外交政策》网站刊登俄亥俄州立大学默森国际安全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博士后研究员约瑟夫·斯蒂布(Joseph Stieb)题为《美国是如何内政化恐怖主义化的》的文章。文章援引作家兼记者斯宾塞·阿克曼(Spencer Ackerman)新书《恐怖统治》(Region of Terror: How the 9/11 Era Destabilized America and Produced Trump)中的核心观点指出，恐怖主义在美国已成为不同意识形态者和利益追求者的政治资源，美国的反恐战争导致其国内政治激进化，将美国推向排外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文明冲突的偏执。“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所附带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包袱不仅使反恐在理论上变得没有合理框定界限，甚至还鼓励美国国内将穆斯林、移民、自由主义者和其他非主流种族群体视为敌人。作者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始于其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恐怖主义、广泛传播民主价值观的诉求。小布

什总统时期，政治精英们希望将反恐刻画为与伊斯兰文明的斗争，而一部分政治精英将反恐作为推动其国内政治诉求的工具。随着特朗普的当选，美国的反全球化思想使得其国内反恐动力更进一步转移到了排外主义，他们希望对恐怖分子发动战争，而非推进任何形式的民主或人权议程，这也部分解释了美国在阿富汗反恐的失败原因。作者认为，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暗示着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弱化恐怖主义的重要性，但由于政治惯性，美国仍然在政治化恐怖主义以服务其国内政治精英的不同诉求，如典型的移民问题与种族问题。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9/11/terror-september11-ackerman/>

撰稿人：杨滨伊

4、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民众对“9·11”事件的看法

9月9日，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其治理研究项目主任威廉·A·加尔斯顿 (William A. Galston) 的文章《二十年后，美国民众如何看待“9·11”事件》。文章指出，“9·11”事件至今仍然是大部分美国成年民众经历过的最重要历史事件。最新调查显示，93%的30岁及以上的美国民众能够准确记住事件发生时的所在位置及周边环境，64%的美国民众认为“9·11”事件已经永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许多少数族裔乘坐航班、进入摩天大楼、参加群众活动或出国旅行的意愿下降。作者发现，美国民众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也发生了长期变化且呈党派分裂。约一半美国民众认为伊斯兰教与

暴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拥护这一观点的多数是共和党人，这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在其执政初期推出针对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此外，“9·11”事件也使国家和民众对潜在恐怖袭击的态度更为复杂，领导人决策变得更加消极，大众对反恐行动的支持随时间流逝而下降，大多数民众对阿富汗撤军能够使美国远离恐怖主义表示怀疑。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fixgov/2021/09/09/twenty-years-later-how-americans-assess-the-effects-of-the-9-11-attacks/>

撰稿人：郭一凡

5、《国会山报》：后“9·11”时代美国外交政策

9月10日，《国会山报》发布新美国安全中心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的文章《“9·11”事件20年后，美国外交政策仍在努力寻求平衡》。文章指出，“9·11”事件使美国及其外交政策失去了平衡。此后，美国将恐怖主义列为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并将反恐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过去20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中国问题上的政策立场变化表明美国时常急于给尚未消失的威胁画上“句号”，试图解决只能被缓解的问题，还倾向于关注单一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或中国。因此，多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缺乏平衡。文章认为，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需平衡美国在各地区的不同问题上的利益、价值观和投入等。美国外交政策的“平衡性”可以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作为全球性大国，美国不能只关心印太地区，还应对欧洲、北

美和中东等地区保持关注。第二，反恐不仅是为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也是为了避免恐怖主义对美国其他优先事项产生负面影响。第三，政策应具备可持续性。第四，面对恐怖主义、朝鲜问题和巴以冲突等棘手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不应以“彻底解决”为目标。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71743-20-years-after-9-11-us-foreign-policy-still-struggles-for-balance>

撰稿人：包坤极

6、威尔逊中心：“9·11”事件之后二十年圣战主义的演变

9月8日，威尔逊中心发布了由苏凡集团（the Soufan Group）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阿里·苏凡（Ali Soufan）撰写的文章《“9·11”事件之后20年圣战主义的演变》。文章认为，在“9·11”事件发生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ISIS）都并未遭受毁灭性打击，保留了激发和指挥全球恐怖袭击的能力。而美国由于过度关注军事斗争，忽视了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不满，未能克服支撑这些圣战组织成功的意识形态。自2001年以来，ISIS和“基地”都越来越多地通过嵌入当地社会区域分支机构而不是集中运作的“核心”来采取行动。基地组织已将其战略从针对西方或“远敌”的全球恐怖，转变为支持局部叛乱以及利用宗派主义和地缘政治冲突。恐怖分子继续利用不满情绪来延续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将阿富汗混乱局势当作可以利用的典型环境。但是，“圣战”组织招募战斗人员的能力大幅减弱，日益依

赖网上极端分子在西方发动持续袭击。最后，作者指出，由于有大片土地处于暴力极端分子和非国家行为者的影响下，阿富汗或将成为圣战组织下一个重点部署地。

<https://www.wilsoncenter.org/article/evolution-jihadism-20-years-after-911>

撰稿人：王叶潜

7、瓦尔代国际俱乐部：俄美关系进入稳定期

9月9日，瓦尔代国际俱乐部刊登了项目主任安德烈·苏申措夫（Andrey Sushentsov）撰写的文章《不再波动：俄美关系进入稳定期》。文章回顾了2014年以来的俄美互动：特朗普上任以来，俄美关系时常剧烈波动；拜登政府任内，2021上半年虽经历两起两落，但双方有缓和态势，6月份的日内瓦首脑峰会是十年未有的突破：双方在峰会上制定了有关战略稳定和网络安全规则的协商议程，将在未来半年至一年里达成一系列协定。作者认为峰会标志着俄美关系趋于稳定。其表现在：一，拜登政府减少国内“通俄”指控，获得更多与俄接触的空间；二，双方都认识到策略性妥协难以发展为战略性突破，更冷静理性地看待分歧；三，东欧地区冲突未持续升级的现实表明，美方有意管理持续紧张的双边关系。因此，文章乐观地预测俄美关系将在未来一年保持稳定，且可能有进一步对话，甚至有所突破。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not-wavering-anymore-relations-between-russia-and-/>

撰稿人：王秀珊

8、《外交学人》：海洋防务外交是印度对华战略的关键

9月9日，《外交学人》发布印度金达尔国际事务学院院长斯雷拉姆·乔利亚（Sreeram Chaulia）的文章《马拉巴尔2021及其他：印度海军对中国的反击》。文章指出，尽管印中竞争以陆地为基础，但两国在海洋中的竞争愈演愈烈。与相对冻结的陆地边界相比，中立开放的公海是两国争夺的主要区域。对印度而言，公海是其与盟友、伙伴开展军事合作以应对中国的绝佳平台。自加勒万河谷事件以来，印度将更多军事资源投向包括印度洋、南海和西太平洋，在这些区域与战略伙伴持续深化合作，包括更大力度参与马拉巴尔军演、与域外大国加强海上军事合作推动、“四边机制+”等。以海洋防务外交建设多层次合作与协调机制，印度能够取长补短，以“非对称”策略应对海军实力更强的中国，并能够利用进攻性的海上行动抵消印中陆地军事摩擦所带来的压力。作者也强调，目前陆上边界冲突管控仍是印度对华政策的底线，但从长远来看，印度海上军事能力将成为其处理与中国领土争端的关键决定性因素。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9/malabar-2021-and-beyond-indias-naval-pushback-against-china/>

撰稿人：许卓凡

9、《战争困境》：美国应制定新的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

略

9月8日,《战争困境》杂志网站发布由美国空军战略威慑研究中心主任阿尔·毛若尼(Al Mauroni)、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和反恐对策研究联合会(START)非常规武器和技术部研究员扎克·卡伦伯恩(Zak Kallenborn)、国防大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中心国家安全政策杰出教授赛斯·卡鲁斯(Seth Carus)和后勤管理研究所(LMI)管理战略研究员罗恩·菲泽尔(Ron Fizer)撰写的文章《21世纪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文章指出,面对战略、政治和技术的新发展,有必要重新部署美国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战略。在技术发展、全球供应链、国际行为体多样化的背景下,生物化学武器、网络武器、人工智能等已成为新的有杀伤潜力的武器,且其迭代速度提升,可得性增强,不可预测性加剧。但目前尚无对其清晰的重新定义,政策、战略、组织议程和威胁评估中的误解加深。同时,国际反WMD规范也受到威胁,一些国家在化学、生物和核武器方面的行为都挑战了现有规范。面对新挑战,美国缺少统一的应对战略,政府各部门各行其是。就此,作者建议出台一个经整合的指导性战略,根据WMD的新挑战调整战略,增进跨部门合作;吸取过去对WMD相关方威慑与国际制裁的经验教训,强化国际规范,提高对恶意使用WMD的惩罚效率;着重应对“灰色地带”等非传统的武器开发行为;关注公共卫生和生物安全,建立相应的应急框架,提升应对新挑战的整体能力。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1/09/a-weapons-of-mass-destruct>

ion-strategy-for-the-21st-century/

撰稿人：崔元睿

撰稿人：崔元睿、王秀珊、许卓凡、任怡静、倪远诗、杨滨
伊、郭一凡、包坤极、王叶湑

审稿人：马国春、黄萧嘉、王静姝、周武华